

文化批評往何處去

—— 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文化討論



文學中國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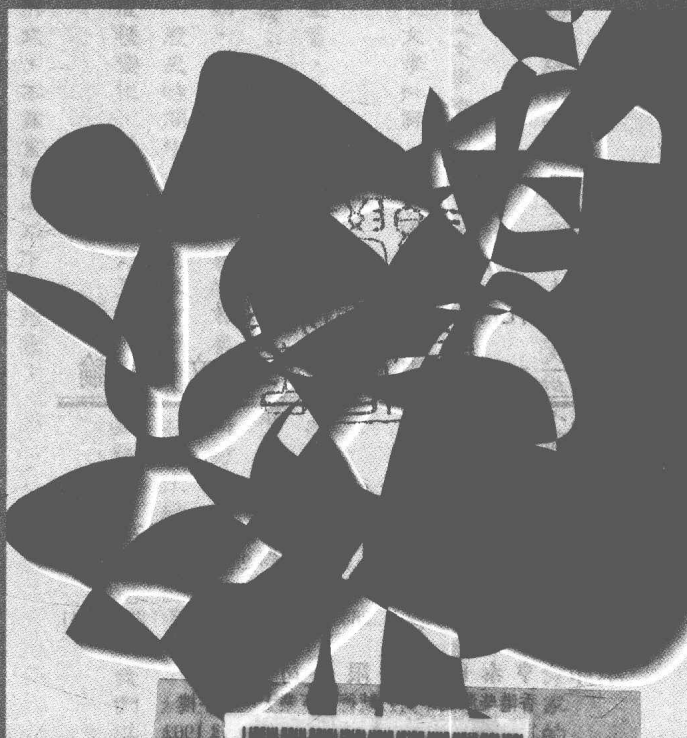
徐賁 著

港台書室

G12
20002

文化批評往何處去

——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文化討論



00819322

文學中國叢書

徐賁 著

《文學中國叢書》編委會

主 編：劉再復

學術諮詢：李澤厚、李歐梵

責任編委：孫立川

《文化批評往何處去》

——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文化討論

作者：徐 賁

出版：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2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八年・香港

叢書前言

一九八七年，本社開始出版第一套文學叢書——《天地文叢》，收集大陸當代作家的一些優秀作品，包括小說、散文、戲劇等。

現在，我們又決定出版《文學中國叢書》，作為本社第二套文學叢書。這套叢書與第一套叢書的重心不同，它側重於文學欣賞、文學批評、文學研究、作家手記，還包括與文學相關的美學研究、藝術研究和更廣泛的文化研究。

在世紀之交出版這套叢書，是因為本社同人和叢書編者感到：我們所處的歷史時間，是非常需要知識者思考的時代。這個時候，世界正在步入新世紀，而中國正在步入現代社會。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動蕩、戰爭、革命、政治運動，只是進入現代社會的前奏，它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正是為了實現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在這一歷史時間中，中國的社會經濟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於此，文化觀念也需要有一個結構性的變化。這種變化，需要一代乃至幾代人的知識活動才能完成。我們以此叢書形式，參與這種知識活動。

作為知識活動的一種形式，本叢書將追求下述特色：

(1) 盡可能吸收世紀之交海內外中國文學、文化研究的思維成果，盡可能反映海內外中國學人新的思

路和立場，使叢書帶有當代時間性特點。

(2) 盡可能反省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歷程和文化歷程，以理性態度面對並質疑在本世紀中流行的觀念和命題，使叢書帶有文化反省性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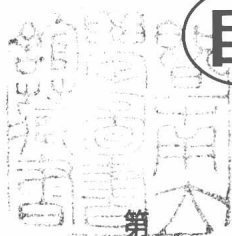
(3) 盡可能吸取青丰一代的人文科學學者、教師、留學生、研究生的學術成果，容納他們的新視野和新語言，使叢書帶有文化連續性特點。

我們的工作是一件建設性、積累性的長期工作。我們不求轟動效應，但求經常、持久效應。因此，我們將如同出版《天地文叢》一樣，逐丰有所累積、有所收穫，從容、踏實地走向二十一世紀。

編輯部

錄

目



引言：「文化討論」

中國式的文化批評……………1

第一輯：文化批評和公民社會……………13

文化討論和公民意識……………14

「我們」是誰？

——論文化批評中的共同體身份認同問題……………27

第二輯：文化批評和社會倫理建設……………43

學術規範的社會理想

——從「新國學」的價值觀談起……………44

從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56

當今中國文化討論需要關注的倫理話語……………88

第三輯：文化批評和大眾文化……………113

影視觀眾理論和大眾文化批評……………114

能動觀眾和大眾文化公眾空間……………137

當今大眾文化批評的審美主義傾向..... 159

第四輯：文化批評的政治文化關注..... 187

重提「政治文化」..... 188

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懼和暴力..... 202

甚麼是中國的「後新時期」和「後現代」？

——「現代性」在當今中國的政治文化意義..... 226

第五輯：第三世界的文化批評..... 247

後現代、後殖民批判理論和民主政治..... 248

從本土主義身份政治到知識公民政治

——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及其文化批評..... 284

第三世界批評在當今中國的處境..... 320

後記..... 339

引言：「文化討論」

中國式的文化批評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隨着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控制的加強和人文知識分子生存策略的調整，中國文化討論進入了一個特殊的時期。一方面，文化討論撤離了八十年代已經開始涉及或展開的許多敏感的學術論題和社會政治問題，如中國文化與專制傳統的關係，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尊嚴、權利、義務，社會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各種體制的變革等等問題；另一方面，文化討論卻又出現了許多新潮流、新說法，如「新寫實」、「新市民」、「後現代」、「後新時期」，還出現了一些頗具多樣性的理論、議題和學術主張，如第三世界或本土文化理論、人文精神、新國學等等。

對於文化討論來說，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發展形態，也為它形成獨特的時代特徵提供了條件。因此，這個時期的文化討論，無論從它的思想內容或者表現形態來看，都成為我們觀察和研究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國社會和知識分子特點不容忽視的一部份。從本世紀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文化以及由文化定義的民族國家身份問題，一直保持着強烈的興趣。他們在各種人文學科領

域裏的思考和寫作直接間接地涉及文化問題，表達他們對自己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觀點和理想，產生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文化討論」的特殊話語範疇。從時間上說，「文化討論」比目前在世界學術界廣有影響的以英國伯明罕學派為濫觴的「文化研究」要早出半個世紀，然而它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卻遠遠沒有得到應得的總結和評價。為了發展與中國國情和社會變革需要相符的文化批評，對文化討論本身的討論越來越成為文化討論者迫切的任務。把那些紛雜多樣的思考、理論、觀點和學術行為放在一起，統稱其為「文化討論」，是在甚麼意義上這麼說的呢？是不是凡是涉及「文化」的都是文化討論呢？「文化」指甚麼？「討論」的目的又是甚麼？「文化討論」和時下學界所說的「文化批評」或「文化研究」有甚麼聯繫？中國的文化討論又有一些甚麼自己的特徵？

中國的文化討論涉及的諸多問題特別集中在這樣一些方面：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傳統和素質，文化或民族的特徵和身份認同，以及這些方面同西方文化相應方面的比較或差異分析。文化討論也包括大量在哲學、歷史、文學、文學理論等專門領域中產生的具有一般文化意義的見解和看法。文化討論還包括那些以引進思想和文化研究新方法、新理論為目的的西方人文研究成果的翻譯和介紹。這樣的人文討論在近代中國史上出現過兩次高潮，一次是新文化運動前後，另一次則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熱」時期。這兩個時期的文化討論都成為產生新知識、新觀念的理論機制。這不單單是就學術性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理論、新方法、新規範而言的，而且也是指與這些新的知識內容相聯繫的，對國家性質、社會政治理念、群體素質和身份的重新評估和變革設想。文化討論中的「文化」因此也就包括思想和與之有關的社會政治體制這兩個方面。

在中國，文化討論從來沒有形成像日本的「日本精神」研究那樣具有明顯辨認特徵的文化民族主義話

語，也不像英國伯明罕研究學派那樣具有明顯意識形態批判專題特徵（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媒體研究等）。中國的文化討論借用了許多現成的話語形式，如報章時評、書籍序跋、書評、歷史或文藝討論等。它一直沒有受到專門的文化理論刊物或體制的規約，它所形成的是一種極為鬆散的話語領域。中國文化討論的鬆散性使得它具有廣大的讀者。這就要求我們在觀察中國文化討論的時候，不僅要關心它的內容，而且還要把它當作一種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發生的「事件」和「社會活動」來看待。對文化討論的討論也就必須從單純的文化文本分析轉入普通人（包括知識分子）的日常生存感受，求變要求，抗爭策略以及他們表達意見和社會參與的特殊條件、限制和方式。

常有人批評中國文化討論沒有嚴格的學術方法，過於急切地從西方汲取新思想，太缺乏社會政治的超然性，一句話，夠不上好的文化理論的標準。戈德曼(Merle Goldman)，林克(Perry Link)和蘇煒對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的「文化熱」的評價，在這類批評中頗具代表性。他們指出，這個時期中國的文化討論和五四運動時期有許多相似之處，這類文化討論「匆匆從西方攫取思想來為中國設想變化的可能，或者至少以此來衡量中國文化的『缺陷』」。他們還以不屑的口吻談到了中國「文化熱」期間對西方理論和學術研究方式的「食而不化」的譯介：「被翻譯的作家令人眼花繚亂，從尼采、韋伯、卡夫卡和薩特到本傑明、馬庫斯、拉康、德里達，從拉丁美洲作家馬凱斯(Garcia Marquez)到法國新小說作家羅伯·格里葉，從意識流、現代派、未來派和超現實主義到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後結構主義、後現實主義和接受理論。還有分析哲學、語言哲學、反常心理學、信息論、系統論和控制論。整個思想界充滿刺激但又十分膚淺。各種時代、傳統和觀點的西方思想家一時眾聲亂嚷，穿上新裝同時登上中國舞台，不和諧地同聲合唱。」①

這樣的批評所表現出來的文化觀和對中國文化討論的社會意義的理解都相當狹隘。它把注意力局限在「學院性」問題上，哪些作家或著作被翻譯或介紹了，不同的思想或理論之間是否和諧相配，譯介是否夠水平，學術是否成系統，專業區別是否門類分明，等等。這樣的批評不能說沒有意義，因為文化討論畢竟是知識生成。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局限在學術之爭和知識界的文化研究上，那就大大看低了文化討論的社會作用，也忽視了這種知識生成的社會政治處境問題：為甚麼中國人在某一歷史時刻一下子變得對外來知識如飢似渴？這是一種怎樣的知識要求？反映了甚麼樣的現實社會政治文化環境？這種知識行為是由誰來參與的？遭到誰的反對？為甚麼新知識的生成會呈現出這樣一種紛雜無序的形態？它在哪些領域中，作為對哪些主流或統治思想觀念的反衝而產生？它的影響又是如何從學術圈波及到外部社會？

我們之所以必須提出這樣一些問題，首先是因為文化討論不僅是一種學術活動，而且是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下發生的「事件」，文化討論應當也可以發揮社會性的作用。其次，文化討論對社會變革的涉入和干預是一時一地的策略性活動，不是一勞永逸的。無論它的知識生成具有何等程度的「學術性」或「專業性」，都不能保證它永遠維持其影響。它所要發揮的作用都必定只與特定的環境相關。文化討論是中國特殊形式的文化批評。文化討論的「知識生成」和「社會干預事件」這兩種作用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卡爾·耐爾森等人對文化研究的社會政治作用的解釋中得到說明。他們認為：「文化研究是由於它在理論和物質文化「普通人日常生活及其文化使用」之間架起了橋梁——它的整個傳統統起的就是這個作用——才對當代學人富有吸引力。」他們同時還指出：「在文化研究中，分析的政治和知識成果的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分析依存於知識成果，對於文化研究來說，理論是知識成果的重要部份。但是，除非知識成果回到文化和政治權力鬥爭的現實世界中

去，除非它對歷史的挑戰作出回應，它並沒有真正完成。可以說，文化研究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受環境的政治要求和體制處境中的事變所驅使的。」他們還注意到了，「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理論有時會變成哲學思辨式的超處境知識，但文化研究卻總是針對特殊社會、歷史和物質條件來進行理論。它的理論總是努力結合現實的社會政治問題。『理論』只有當回到更廣泛的物質關懷，並以此來考驗它自身話語的社會作用的時候，才能在文化研究中得到廓清和促進。」②

在對普通人日常生活及其社會環境的關切上，中國的文化討論和西方的文化研究是一致的，它們是兩種不同傳統但社會作用相似的文化批評。文化批評是一種社會活動，而不是一種「學科」或者「學術領域」。文化批評者綜合運用專門學科（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理論、人類學等等）的理論概念和分析方法來研究他們在不同文化形態中查察的有關人們實際生存的種種問題。這些文化形態包括精英文藝、大眾文化、日常生活等，而文化討論者或研究者從中辨查發現的種種問題便稱為「文化問題」。因此也可以說，文化批評關注的對象甚至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問題。「文化討論」是中國特有的文化批評形式。與西方的「文化研究」相比，中國的文化討論是在它自己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由它自己特定的發展形態所形成的。這可以從它的社會形態和它提出的問題（包括研究成果）來說明。

中國的文化討論是在本世紀初中國原有的社會政治文化秩序及其合理性面臨來自西方的巨大衝擊的情況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不僅在時間上比西方的文化研究早出半個世紀，而且所涉及的社會形態也截然不同。中國的文化討論是在中國社會由前現代向現代轉化的社會形態中形成的，它面臨的任務是中國如何現代化；而西方的文化研究則是在六十年代初，當西方現代社會出現深刻危機，向後現代社會形態轉變時形成

的，它當時面臨的任務是如何去認識與這一現代性危機有關的文化結構性變化。五四時期和八十年代的文化討論。從外部原因看，都是在外來優勢文化的衝擊下發生的。但是，它們面臨的外來衝擊的性質是不同的。五四時期的外來文化有明顯的暴力威脅，造成了文化討論中民族存亡的危機感。八十年代的外來文化雖然相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有優勢，但卻是中國人主動開放和拿來的對象。人們只有一種極大的落後感，而並沒有國家存亡的急迫危機感。從內部原因來看，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經過幾十年無效的應變措施和內外戰爭，陷入了走投無路的境地，文化討論也因此充滿了激憤和徹底了斷的革命精神，表現了強烈的反傳統文化立場。八十年代的文化討論則不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壞是在並無外國威脅，而國家自一九四九年後已經獲得安定和相當發展的情況下發生的。人們在對社會主義這條救中國的出路嚴重失望後，再一次積極尋找社會變革的其它可能。文化討論雖然再一次出現了批判傳統文化的聲音，但那主要是爲了借以區分前現代和現代社會的特徵，提出中國社會全面現代化的任務。

如果說中國文化討論是在缺乏現代化的社會形態中發展起來的話，那麼西方的文化研究恰恰是在現代化已充分發展並出現了危機的時候興起的。西方的文化研究的興起，如耐爾森等人所指出，是出於「認識形成現代、後現代社會和文化的種種進程的需要」，這些過程包括工業化、現代化和都市化，大眾媒介的崛起，「已知群體」的瓦解，文化生活越來越商品化，西方殖民帝國的崩潰，新型帝國主義的形成，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性大眾文化擴散等等。③與這種現代／後現代型的西方式文化研究相比，中國的文化討論長期以來是前現代／現代型的，九十年代才逐漸向現代／後現代型轉化。但必須看到，在中國這種轉化還剛剛開始，根本不像某些論者所說的後現代性已代替了現代性。事實上，目前中國文化討論的特點是前現代／現代型和現代／後

現代型並存，而前者與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現實的關係則比後者更為密切。世紀初和八十年代文化討論都是出於認識中國從前現代向現代發展的進程的需要，或者爲了促進這些進程。這些進程包括人性的張揚和獨立，社會和政治結構理性化和民主化，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建立各種現代體制等等。八九年後的文化討論則處在一種更複雜的社會形式之中，一方面，上述的進程至今仍在持續之中，它們之所以還有現實意義，是因爲阻礙它們的力量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八九年以後，現代性在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技術、經濟及國家的現代化並沒有與政治觀念、體制、公民社會及人的自我認識的現代化同時發生；現代化既帶來了生活方式和社會觀念的許多變化，也帶來了物質基礎空前加強的現代專制。這些都使得文化討論再也不能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水平。

認識中國文化討論，還必須瞭解它提出的問題和研究成果的歷史。在這方面，中國文化討論也與西方從英國伯明罕學派發展衍化出來的文化研究有着明顯的差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英國學者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湯普森(E. P. Thompson)的文化研究集中在工人階級和媒體文化這些在當時英國社會中被普遍感到但尚未得到充分重視的問題上。二次大戰後，英國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像經典馬克思主義預言的那樣呈現空前的政治、經濟、文化危機。相反，在政治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對抗以前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中，達到了某種利益的一致；在經濟上，資本主義經濟復興並促成了福利國家制度，減緩了階級矛盾的對立；在文化上，以通俗性、娛樂性爲特徵的大眾文化廣泛流行，促使社會文化趣味日益趨同。在這種情況下，以一九六四年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中心的建立爲標誌的文化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對西方文化研究產生深遠影響的文化觀念和研究方法。它把研究的重點轉入

日常生活文化而非精英文化的考察，還調整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模式，把研究重點轉向文化和文化機構，賦予文化以獨立的不從屬於經濟基礎的意義。他們更是從文化批判的需要對「文化」本身重新作了定義。例如，威廉斯在提升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的同時，一改將文化視為文學、藝術同義詞的傳統文化觀，從人類學角度重新定義文化。他認為，文化是一個「完整的過程」，是某一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不僅在藝術和知識過程中得到表達，同樣也體現在機構和日常行爲中。從這一定義出發，文化分析也就是對某一特定生活方式、某一特定文化或隱或顯的意義和價值的釐清。」④因此，文化研究的對象不僅應包括學術和想像性作品及其與特定社會和傳統關係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應該包括被其它文化定義所排斥的領域：日常生活方式、生產機制、家庭結構、社會機構等。就傳播媒體而言，文化研究不僅要對媒體產品進行文本分析，而且應該透視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機制，發現文本背後隱藏的機構運作。

與上述的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相比較，不難看出，中國文化討論所關心的問題絕大部份與中國的封建制度、不民主的政治傳統、社會價值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國家發展和文化更新要求有關。這些問題包括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中西文化的比較，民族文化的自我認識、批評、重建以及在現代世界中的定位等等。在中國文化討論從前現代／現代型向現代／後現代型的逐步轉向進程中，它所面臨的問題也出現了變化。其中一個相當迫切的問題就是公民社會的建設。它曾是前現代／現代型文化討論所忽略的問題。公民社會問題之所以特別緊迫，是因為它不僅關係到文化討論本身的存在和發展的條件，而且還關係到文化討論者主體在現代民族國家和社會中的基本身份（公民）定位。因此，我在本書第一輯的文章中首先討論的是與文化討論有關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識問題。

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文化討論仍十分強調文化文本分析，而沒有把研究重點轉向大眾生活及其文化使用，這削弱了它介入公民社會建設的能力。在九十年代出現的文化討論中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精英主義傾向。它一方面深切地感受到社會倫理規範危機（常常被視為某種高等文化價值的失落，如學術的失範或文人的墮落），另一方面則對社會中的普通大眾的日常文化及其使用，從其「缺陷」入手，對其缺乏「道德嚴肅性」或「美學價值」大加撻伐。面對這兩種情況，我在第二和第三輯的文章中分別討論與社會倫理和大眾文化有關的文化討論問題。

中國目前的文化討論，由於主觀的學術至上傾向和客觀政治氣候的限制，在文化定義和文化研究對象上，也還沒能充分包括文化機構、政治體制和社會機制，相反，倒是常常採取狹隘的純文化主義傾向，避免一系列在政治上敏感的問題，如現存的統治文化秩序為誰的利益服務？以何種手段規範人們的選擇和偏好？誰希望、誰不希望維持這一文化秩序？如何從文化權力、支配、反抗、抗爭去考察這種文化秩序？針對這一局限性，我在第四輯的文章中集中討論了文化討論關注政治文化的必要性和政治文化在中國的一些特徵。

從五四時期延續至今的各種中西文化比較使得中國文化討論具有一種獨特的世界意識。但這種世界意識還不夠多元化，還嚴重地受到中西兩極（或兩個對立中心）模式的制約。八九年以後出現的「第三世界」和「後殖民」批評雖然強調中國的第三世界性以及它在當今世界秩序中的「邊緣」位置，但仍然主要以與西方文化的對立，而不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員身份來為中國文化定位。這種強烈地缺乏平等感的文化對立意識甚至導致中國式的第三世界批評形成了狹隘的文化本土主義和困守心態，使它在文化討論中以昭告本土自足性的身份政治代替以爭取人的解放為目的的人道政治，以「反西方」來代替「反壓迫」。有鑒於此，我在第

五輯的文章中特別介紹了第三世界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具有解放性的人文涵義並對當前中國式的第三世界批評提出了我的看法。

本書中的論文都和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文化討論」有關。我把「文化討論」看成是在中國特殊環境中形成和起作用的文化批評，是一種在當前應當充分關心中國民主和公民社會建設，體現社會責任心的文化活動。但是，我認為，文化討論並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文化活動，我們應當把它放到「比較文化批評」關係中，與當代世界中別種類似活動相互參照，加以認識。我在本書中所涉及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研究」這一參照對象，提到的也主要是西方的文化理論，這是由於我個人學識範圍的緣故，並不暗示那是唯一可能的參照對象。

本書中所收的十四篇文章雖然是單獨成文的，但它們卻都圍繞當今中國文化批評的社會責任與民主理念的關係這個總論題展開，它們所涉及的五個方面——公民社會和公民意識，社會倫理建設及資源，大眾文化及其公眾社會空間，政治文化，以及中國文化批評的第三世界特性——僅僅是許多可能方面的一些例子。而且，我們對每一個在此涉及的方面也還可以提出許多其它的問題。中國文化批評還有待於越來越多關心中國社會發展的人們去參與，也只有這樣，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作用才能越來越顯現出來。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於柏克萊